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宸衷 独断

明初皇权政治及其他

南京大学出版社

赵 骥 著

卞孝萱 胡阿祥 主编

赵 骥 著

中国改革
史鉴丛书

宸衷 独断

明初皇权政治及其他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宸衷独断：明初宣权政治及其他/赵骥著.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4

(中国改革史鉴; 5/卞孝萱, 胡阿祥主编)

ISBN 7-305-03319-7

I. 宸... II. 赵... III. 政治制度-研究-中国-明代
IV. D69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9158 号

丛 书 名 中国改革史鉴
书 名 宸衷独断——明初皇权政治及其他
著 者 赵 骥
责任编辑 潘 清
装帧设计 杨小民
责任校对 莫皎平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南京汉口路 22 号南京大学校内 邮编 210093)
印 刷 南京大众新科技印刷厂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开 本 850×1168 1/32 印张 7 字数 180 千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本册定价:12.00 元 总六册定价:72.00 元
ISBN 7-305-03319-7/K·234

声明:(1)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2)本版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发行部负责退换。

发行部订购、联系电话:3592317、3596923、3593695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

总 序

卞孝萱 胡阿祥

一

改革大潮正以磅礴之势席卷中华大地。

发端于 1978 年的当代中国改革,已走过了二十多年的辉煌历程。

改革需要理论的指导,改革需要实践的开拓,改革同样需要历史的借鉴。

悠久的历史,留给我们丰富的改革遗产。在当代中国改革进入关键时刻的今天,系统研究中国改革史,从中汲取改革的精神力量,并廓清中国历史上一次次改革的背景、改革的举措、改革的得失等等,这对更好地把握现在,推进现实改革更稳健、更迅捷的发展,无疑有着巨大的意义。《贞观政要·任贤》记载唐朝著名政治家李世民的话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鉴其利害得失,以为知来视往之资”,本丛书取名“改革史鉴”,其意正在于此。

二

《易·系辞》:“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宇宙间万事万物无不处于不停的变化、运动之中。大至天体,小至原子,变是绝对的,不

变是相对的。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当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生产力进一步向前发展时,当过时的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时,改革就必然会出现。

战国时期大改革家商鞅云:“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吕氏春秋》称:“世易时移,变法宜矣。”隋文帝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龚自珍则以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变易。”这些论述都深刻地阐明了改革的必然性。

改革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有史籍记载的大中型改革有几十起之多,小改革更是不计其数。中国社会在波澜壮阔的改革中,不断地开辟着前进的道路。人们常说:只有改革才有出路,改革之势不可逆转。这是建立在对历史规律深刻洞察基础之上的断语,有着极为丰富的思想内涵。

三

我们以为,中国历史上的所谓“变法”、“革新”、“改制”、“新政”云云,大体是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挽救危机、维护统治之举,重在体制和政策的厘正和变通;它往往发生在国家机器不能正常运转,政治、经济危机已威胁到政权生存的危急时刻。作为通常人们公认的改革,这当然是改革史的研究对象。但是不独仅此,在规模、气势、影响等方面更大的一类改革,是改朝换代之后的开国时代之重新制章立典。这样的制章立典,形式上是针对前朝之弊而多所兴革,目的上是求得新王朝的长治久安;对于社会制度的发展与完善,这类改革常常具有重大的阶段意义。值得指出的是,同样是出于社会制度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的目的,然而措置失当乃至与客观规律根本悖背者,如王莽的托古改制,我们也纳入了改革的范畴加以论述,并且认为,这样的“改革”也不能忽视。然则以上述

的认识来通观中国历史,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中国历史的演进,正与不断的改革相伴而行;内容繁富、各具特色的改革,正是中国历史这本厚书中最引人入胜、最予人启迪的篇章之一。

四

系统、深入地研究中国改革史,可以从三个方面展开:改革的横断面(分时期或断代)研究;改革的纵向分类研究;改革家研究。

就横断面研究而言,因为改革是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相适应的产物,所以改革的发展进程与社会发展阶段是相一致的;在社会转型时期,改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呈现出汹涌澎湃之势:春秋战国时期的各国改革,其性质都是封建化改革,在改革中完成了社会形态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大转化;晚清作为中国历史上又一改革活跃期,改革此伏彼起、连绵不断,而其核心内容则是企图以资本主义制度代替封建制,这同样是伟大的变革。改革又是统治阶级自我完善、强化统治的手段,以此,改革的成败,往往直接关系到王朝的兴盛和败落;不同王朝的不同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地理环境、民族形势、政治状况、经济条件、文化特征,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甚至决定了改革的内容与取向。比如秦、西汉的改革,以建立、健全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为核心;十六国北朝以胡族入主中原,汉化、封建化改革就是无可选择的主题。封建社会前期的唐朝与封建社会转向后期的宋朝,改革也表现出不同的面貌:隋、唐前后相继的不断改革,促成了大唐盛世的到来,宋初强干弱枝、分化事权的改革,却导致了两宋冗兵、冗官、冗费的恶果;又契丹、女真、蒙古所建立的辽、金、元王朝,在祖述与变通之间,备尝许多体制尴尬并存所带来的无奈;到了明、清,改革造成了极端的君主专制,改革也最后一次迎来了大清盛世,然而中央集权封建体制走向衰朽,封建社会的没落以至崩溃,却非改革所能挽回。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总序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转化,不同的王朝及其更替,改革有着规模、内容、性质上的不同;以此,中国改革史分时期或断代的研究,可以全面展现改革的背景、改革的面貌及改革的功效,事实上,这也是治中国改革史的传统做法。但改革史研究的另一种方法即纵向分类研究,其实也很值得尝试。例言之,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由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而宋太祖、明太祖,随着不断的改革而日益加强;地方行政制度,自秦始皇全面推行郡县制以来,围绕中央与地方关系这个症结,政区层次变化不定,划界原则反反复复,机构设置屡次调整,却始终寻找不到最佳的方案;又选官制度方面,由奴隶制时代无所谓“选官”的世卿世禄,到封建社会的养士军功、察举征辟、九品中正、科举考选,真可谓不断兴革;再如赋税制度,也有着丰富的改革内容:赋税形式从劳役税发展到实物税再发展到货币税,赋税摊派从以人户为单位转变到以财产为标准,赋税征收由人口税、土地税、劳役等项单独分征演化为合而归一,无不与重大的改革活动相联系。其他诸如中国历代治国思想的嬗变,中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改革,中国历代民族政策与民族治理机构的变化,乃至中国历代改革思想与理论及反改革思想与理论等等,也都是中国改革史研究的上好选题;而且这样的研究,既富学术意义——与改革史的横断面研究互为补充与完善,从而有利于对改革史的深层次把握,也极具现实价值——其间所体现的改革的艰难、反复与伟大,所揭示的改革的规律,所显出的改革的经验与改革的教训,都值得今人深深地反思。

当然,除了以上一横一纵的改革史研究之外,改革家也可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一部改革史,是与许许多多改革家的个人活动紧密关联的;虽然改革家无一例外地都是当时社会统治阶级利益的代表者,改革的根本目的也都是为了巩固其阶级统治,但只要改革家的举措代表了社会进步的要求,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就可以认为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有利于国家和人民,这正如范文澜先生在

《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一文中所指出的：“被统治阶级爱祖国也爱及国家和君主，统治阶级中某些人爱国家和君主也爱及祖国，只要归根是有利于祖国和人民，他们的行动都值得尊崇”；那些“改善政治”、“法施于民”、“以死勤事”、“以劳定国”的统治阶级人物，“依据他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实际贡献，都可以称为爱国者”——改革家作为统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正是这种特定意义上的爱国者；爱国主义的精神力量，鼓舞、驱使着古代、近代的改革家们勇于奉献、不惜牺牲。然则如此说来，为改革家立传，为改革群体画像，也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五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属改革的横断面研究。我们选择了中国历史上一些具有代表或典型意义的时期或朝代的改革，探讨改革的背景、措施、政策，改革中的斗争，改革成功或失败的原因及其对后世的影响。我们追求学术性与普及性的协调统一，不故作高深，而力求深入浅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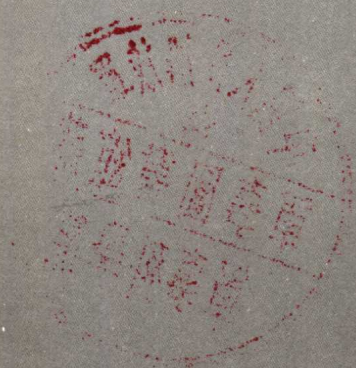
必须强调的一点是，改革史研究不可能为当代改革提供现成的模式；当代改革的理论与实践，是另一个亟待全面研究的宏大课题。改革史服务于现实的主要方面，还在于启迪思路；丰富的改革经验，深刻的改革教训，不畏艰险的改革勇气，都可供当今改革家提炼观点，概括规律。至于读者，在阅读我们这部奉献于伟大时代的不成熟的《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时，则关键是要汲取古代改革的精神，明了唯有改革才有出路的事实，进而理解改革，参与改革。

是为序。

1999年6月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华民族历来重视治史。世界几大古代文明，只有中华文明没有中断地延续下来，这同我们这个民族始终注重治史有着直接的关系。几千年来，中华文明得以不断传承和光大，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先人懂得从总结历史中不断开拓前进。我国的历史，浩淼博大，蕴含着丰富的治国安邦的历史经验，也记载了先人们在追求社会进步中遭遇的种种曲折和苦痛。对这个历史宝库，我们应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断加以发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断作出新的总结。这对我们推进今天祖国的建设事业，更好地迈向未来，具有重要的意义。

江泽民



目 录

《中国改革史鉴丛书》总序

引 言	(1)
第一章 明初官制改革	(3)
一、“胡蓝之狱”	(4)
二、“中央政府”的嬗变	(20)
三、地方官制的改革	(34)
第二章 明前期的特务政治与明初的文字狱	(49)
一、明前期的特务政治	(50)
二、明初的文字狱	(84)
第三章 明初教育制度改革	(96)
一、荐举与科举	(97)
二、学校	(103)
第四章 明初军事制度改革	(119)
一、统御机构	(120)
二、卫所与军户	(127)

目 录

第五章 明初法律和监察制度改革	(137)
一、法律	(137)
二、监察制度	(148)
第六章 明代社会政治经济综合改革	(154)
一、明初——发展经济,改革赋政	(154)
二、明中叶——弘治“中兴”	(172)
三、晚明——张居正改革	(179)
结 语	(207)
主要参考文献	(212)
后 记	(213)

引言

洪武三十一年(1398),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 71 岁了。是年闰五月初十,这位牧童出身、当过和尚、有着传奇般经历的老皇帝,终于被他手创国家的繁重国事所累而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了他心爱的大帝国,躺在他生前看中的风水宝地之中,就是今天南京东郊的钟山之麓。在他临终前的遗嘱中,有这样一段话:“朕膺天命三十有一年,忧危积心,日勤不怠”^①。这确实是朱元璋一生的写照。在元末连年军阀混战割据的状况下,他借助红巾军的力量,为自己谋取了一席之地,站稳了脚根,然后又经过多年的南征北战,最终获得了君临天下的问鼎之尊。为了巩固他苦心创立的这番基业,朱元璋淋漓尽致地施展出他个人的才智和谋略,不惜一切,不择手段地维护皇帝的地位和权力,把皇权隆尊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不仅如此,朱元璋还为其后代的子孙安排好了万世之业,以冀他开创的江山能够流传下去。然而这位辛苦一辈子的老皇帝,作梦也没有料到,在他刚刚撒手人寰之际,皇室内部便烽烟骤起,一场为争夺皇帝宝座的厮杀在他的至亲骨肉之间展开,演绎出一幕惨烈血腥的争斗。

作为朱元璋个人而言,他毕生的心血和精力可谓付之东流了,因为他创立的江山,并未曾根据他生前的规划和愿望,按照正常的皇统传承下去。在失去皇太子之后,他晚年悉心培养和扶持的皇太孙,也是他全部希望所在的年轻皇帝朱允炆,并未能像他的祖父

^① 《明史·太祖本纪》。

那样去干一番惊天动地的鸿图大业,在不到四年的时间内,把祖父传给他的皇帝宝座也丢掉了;而镇守边关的藩王,原本是朱元璋为了一朝有变诸王能统兵勤王而设立的,却反而成了威胁皇孙皇位的军事异己力量,甚至连朱元璋自己亲自选定的国都,也随其身后而改变。但所有这一切却丝毫没有影响朱元璋对巩固皇权独尊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他的这种努力在其后代子孙手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和发展,成为维系这个王朝长达 276 年之久最有力的举措,也为后世留下了诸多值得回味的话题。

洪武一朝,朱元璋不仅为他的子孙奠定了大明帝国的基业,更为他的后代留下了许多为巩固皇权政治而精心设计、制定的一系列制度。因担心丞相的权势过大而影响帝位的稳定,朱元璋将实行了一千三四百年之久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了;军队是巩固国家的根基,十几年的军旅生涯,使朱元璋亲身体会到“枪杆子”与政权之间的血缘关系,他建立的卫所制度终于解除了武将对皇权的威胁,铲除了藩镇割据的根基;为了监视臣民的一切活动和言论,朱元璋创立了军事警察制度,即臭名昭著的锦衣卫,使得有明一代一直笼罩在特务政治的恐怖之中;为了钳制思想,禁锢意识,朱元璋亲手导演了一场文字游戏,这场血淋淋的文字游戏,竟然与整个明朝相始终!

俱往矣,大明帝国和大明帝国的改革!然而,当我们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又或许能从中得到新的领悟,来正视我们今天的社会大变革。

第一章 明初官制改革

权力欲极强的朱元璋在取得政权后不久,便对丞相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而丞相胡惟庸却极力维护自己的地位,个人之间的矛盾竟引发为一场巨大的政治灾难。朱元璋便借机大兴“胡蓝之狱”,扫除了一切异己的政治势力,乘势将实行了一千四百多年的丞相制度彻底废除,并创立了内阁制度。当中央的政权被朱元璋牢牢地掌握在手中时,地方政府的政权却被他颇具匠心的一分为三。这巧妙的分合,使朱元璋成为中国历史上权势最大的皇帝。

——作者题记

从品行上来看,朱元璋是一个典型的能“共苦”而不能“同甘”的人。靠着自己的人格魅力,他团结了一批为他创建帝国南征北战的能人贤才。打下了江山之后,照理要为这些人论功行赏,加官晋爵。可当了皇帝的朱元璋多少对昔日的许诺有些后悔,他实在是不想让这批人过多地分享胜利的果实。在他把赏赐与封号给予这些新权贵的时候,心中便早已想好了如何将这赏赐与封号统统夺回的办法。正当这些勋臣贵戚弹冠相庆的时候,限制权贵的种种政策开始接踵而出,过去朋友之间的亲近已被君臣之间的距离所替代。不仅如此,为了巩固和突出一人独尊的地位,朱元璋对权位仅次于他的丞相越来越不满,限制和指责也日益增多。不幸的是,新一任丞相胡惟庸过高地看重自己,对皇帝的种种限制和指

责并不放在眼里,依旧我行我素,于是皇帝与丞相之间的冲突白热化。朱元璋毫不犹豫地挥起了手中的利剑,导致了洪武朝的第一次大屠杀。

一、“胡蓝之狱”

1. 帝相矛盾的历史溯源

皇帝和丞相之间的关系,历来不好处,这是一个很深刻的政治问题。

长期以来,中国古代封建社会政治制度中一直存在着皇权与相权之间的矛盾,皇权与相权之争几乎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政治制度发展的全过程。秦始皇在中央政府设立三公六卿,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丞相是三公中地位最重要的官职之一。但由于封建政治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帝相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皇帝要通过宰相(丞相)有效地管理庞大的官僚队伍和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就必须赋予他们很大的权力,包括行政的、财政的,甚至是军事的;另一方面,一旦宰相(丞相)获得并掌握了足够的治国理家的大权之后,客观上势必对皇权的独尊提出挑战,进而构成对皇权政治的严重威胁。在秦代极其短暂的历史中,便出现了“指鹿为马”的事件。

历代的帝王都企图在不破坏封建社会政治结构完整性的前提下解决这一矛盾,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采取了不同的解决方式,以期在保证皇权独尊的条件下,满足封建社会正常的管理秩序和生活方式的需要。秦汉时期,相权很重,入则参决朝政,出则号令百官。丞相上朝就连皇帝都要在御座上欠身示意。汉武帝时为了削弱相权,开始在内廷设尚书台,任用皇帝身边的近侍参议机务,以此来缩小丞相的权力。至东汉时,尚书台的职权进一步扩大,形成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局面。隋唐的帝王们为了减少丞相

与皇权之间的冲突,开始对原有的政治制度进行大幅度的调整,设立了三省六部制。三省长官都是丞相,一般有四五人同时为相,有时朝中的丞相竟多达十余人,他们互相牵制,谁也不能专权,凡事均由皇帝最后决断。中唐以后,皇帝还将身边的近臣冠以“同平章事”、“参知政事”等名号,与三省的丞相共同处理政务。至两宋时期相权又继续遭到削除,宋太祖赵匡胤在称帝后的第二天便给丞相范质来了个下马威。他在上朝时谎称自己眼睛看不清,要范质把奏章送到他手中,范质刚起身上前,就被身后早就安排好的宦官趁机撤掉了座位,范质只得尴尬地站在一旁。从此丞相在朝上只能站着与皇帝对话,再也不能“坐而论道”了。在造成了形式上的“不平等”之后,宋太祖对相权继续进行分割,将军权交给枢密院,将财权给三司使,丞相只剩下了行政之权。然而,历代削弱相权、加大皇权的努力,都未能彻底解决皇权与相权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

在建立全国性的政权之后,原来吴王时期的区域政权一时间尚不能随着朱元璋势力的迅速扩大而改变,无法在短期内适应全国大区域行政管理的需要。而此时朱元璋的主要任务是对付北方残元的势力和南部的分裂政权,不可能在短期内构建出新的统治机构和政治秩序。于是洪武初年明朝的中央政府机构只得暂时承袭元朝的旧制,在中央设立中书省,作为统御全国的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设有左右丞相,总理吏、户、礼、兵、工、刑六部的工作,并负责掌握国家的军事大权。不仅如此,中书省在与地方行政机关的关系中,还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在朱元璋对地方行政机构改革之前,明初地方行政机构也是承袭元制,设立行中书省,成为中书省在地方的派驻机构,是中书省对地方管理的自然延伸,使得中书省无论在中央或地方都享有十分特殊的政治地位。在明朝开国最初的几年里,朱元璋的主要精力仍然忙于军事战争,尚无过多的心事去构建大帝国的未来及其政治秩序,而中书省又的确在这段过渡时期对朱元璋起了较好的辅助作用,因而皇权与相权在

这种情况下形成了短暂的相安无事的局面,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渐渐出现了。由于中书省掌握着全国的民政、财政和军事大权,其职掌延伸得愈广,权力愈重,与皇帝的冲突也就日益尖锐,朱元璋便开始着手以其特有的方式对此进行了调整。

2. 胡惟庸事件

明初的开国功臣,大多和朱元璋是同乡故里,朝廷中的重要官员几乎都是淮人。早在朱元璋占据集庆(今天的南京)时,诗人贝琼曾道:“两河兵合尽红巾,岂有桃源可避秦?马上短衣多楚客,城中高髻半淮人。”^①虽然诗人从心眼里看不起这些新贵,但从中可见当时得势之人,大多是朱元璋的老乡。到明朝建国之后,淮人在政治上、经济上越发占有优势,他们并不满足既得的利益,总是千方百计地获取更多的特权。他们不顾禁令,私蓄家奴,巧取豪夺,侵占土地,尤其是立有战功的勋戚更是肆无忌惮,“时武臣恃功骄恣,得罪乡里”,^②“诸勋臣所赐公田庄佃,多倚势冒法,凌暴乡里”^③。他们一方面恣意妄为,处处行使特权,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践踏了法律的尊严,另一方面又严重违反了明朝中央政府的人口管理的制度,损害国家的经济来源和财政收入。这批勋戚权贵又以中书省的丞相为其政治势力的总代表,他们的行为一定程度上侵害了皇权的尊严,引起了朱元璋的强烈不满。为此他采取了专门措施,颁布了《申诫公侯铁榜文》,并特命工部铸造铁榜,将申诫公侯的条令镌刻在铁榜之上。铁榜的主要内容是不许公侯之家强占官民的土地、湖泊和矿山;不许功臣的家奴仗势欺凌乡民,侵夺财物;不许公侯之家倚势隐瞒人口等六条。此后朱元璋又颁布了《臣戒录》、《大诰武臣》等文告,三令五申各种对权臣的禁令,

① 《清江诗集》卷五《秋思》。

② 《明通鉴》卷三。

③ 《明太祖实录》卷七十。